

创造就业：为什么一些 国家取得较好的成绩

Pietro Garibaldi
Paolo Mauro



创造就业：为什么一些国家 取得较好的成绩

Pietro Garibaldi
Paolo Mauro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00年

丛书编辑

J. R. Morrison

基金组织对外关系部

封面设计编排

Massoud Etemadi, Jack Federici, 和

基金组织制图科

ISBN 1-55775-958-8

ISSN 1020-8399

2000年4月出版

如欲订购基金组织出版物, 请洽: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blication Services
700 19th Street, N.W., Washington, D.C. 20431, U.S.A.

电话: (202) 623-7430 传真: (202) 623-7201

电子邮件: Publications@imf.org

因特网址: <http://www.imf.org>

前言

《经济问题丛书》是为了向广大非专业读者介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各种经济类专题取得的某些研究成果。丛书的素材主要来自基金组织的工作文件、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和访问学者编写的技术性文件以及政策研究文件。

以下文件的素材原载于Pietro Garibaldi和Paolo Mauro撰写的基金组织第99/109号工作文件，题为《创造就业问题解析》。这篇经过缩写的文件中提到的研究结果均出自第99/109号工作文件，读者如欲购买该工作文件（定价7美元），可洽基金组织出版物发行处，或从www.imf.org下载。本缩写文件的编写人为Charles S. Gardner和Jeremy Clift。

创造就业：为什么一些国家取得较好的成绩

在过去10年中，美国在创造就业方面非常成功。一些其他工业化国家则显然落在后面。但是，为什么一些国家在创造就业方面比其他国家取得更好的成绩？是否有一些共同的因素可以用来解释创造就业问题？

创造更多的就业是很多欧洲国家面临的一项挑战。众所周知，欧洲大陆的失业率（1999年，欧元地区的失业率为10%）显著高于美国的失业率（4.5%）。但是，即使在欧洲大陆，各国之间也存在着很大差异，最近，失业率最低者如葡萄牙，为4.5%，最高者如西班牙，则为16%。

为了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的失业率高于其他国家，人们进行了很多研究。但对于各国在创造就业方面的相对表现，人们给予的注意则比较少。本文件介绍了基金组织工作人员进行的一项新的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该项研究系统地分析了工业化国家在过去20年内创造就业的表现，其中特别侧重于欧洲内部的差异。



新方法的好处

把分析重点改为创造就业有四个好处:

- 衡量就业比衡量失业容易得多。在衡量失业水平时，需要辨别作为劳动力一员的个人和那些不在劳动力之中的个人之间微妙的区别：那些被作为失业者计算的人必须表示，自己正在积极地寻找工作；然而，特别是在高失业率国家，所谓丧失信心的员工会停止寻找工作，因此没有被计算在内。相反，很多自称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可能是半心半意，随着找到工作的前景逐渐渺茫，他们就越是如此。
- 需要更好地理解创造就业问题的第二个原因是，无论失业水平如何，加速创造就业都会增加一个国家的产出并带来其他好处，包括提高工作人员与领取养恤金人员之间的比率，从而降低社会安全网的费用。
- 第三，在把重点转到创造就业上时，通过研究失业问题获得的知识不一定仍然适用。例如，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使得员工的解雇比较困难或成本较高的法律、方案和劳资协定看来不对失业率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强有力的保护就业制度在妨碍创造就业方面似乎产生很大影响。
- 最后，如果分析就业的增长，而不是分析在失业方面取得的经验教训，会带来更为丰富的成果。例如，我们无法从失业数据中得到任何信息来了解就业市场可以提供的工作种类，也无法了解员工的就业条件，诸如他们是长期工还是临时工，是全日工还是小时工。研究这些因素使我们能够对各种问题进行评估，其中包括，美国创造就业的速度高于欧洲大陆是否为历史条件所造成，例如在美国，农业或传统制造业就业的比重比欧洲低很多，而这两类就业在所有发达国家一

直停滞不前或不断下降。这个方法还可以用于检查近年来更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并可有助于我们理解重要的政策问题，例如促进小时工作机会的增加到底是导致了全面就业的增加，还是减少了全日工作机会。

反对这种方法的不无道理的论点是，从很长的期间来看，就业增长只不过应该等于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然而，在中期，即大约20年的期间内，政府的政策和体制上的差别可以对决定参与劳动力市场的人在工作年龄人口中所占比重产生很大影响。此外，创造就业的速度对工作年龄人口本身的增长也产生影响，因为就业增加速度最快的国家一般会吸引更多的移民。

过去20年中，发达国家之间的就业增长情况差别很大。在欧洲以外地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创造的就业大大超过多数欧洲国家。在欧洲内部，法国、意大利和某些北欧国家在创造就业方面落后于其他国家，而荷兰和爱尔兰创造就业的速度则很快，在九十年代尤其如此。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研究采用标准的统计方式，对多种多样的数据进行了分析，这些数据反映了所涉国家在创造就业方面的不同表现。在研究每个国家的情况时，都对年龄组和性别组、经济部门以及合同类型（小时工与全日工、临时工与长期工）进行了分析，并分析了它们同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些因素支配着关于整个就业市场表现的公共政策辩论，尽管多数的劳动力市场理论都侧重于总的就业和失业。

这项研究看来是人们的第一次尝试，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21个成员国在中期内的创造就业表现进行详细的跨国比较。但是，为了确定这项研究工作引起的某些政策问题，还需进行大量的进一步研究。例如，简单的统计相互关系和计量方法在查明原因和影响方面会产生严重误导。

另外需注意的是，这项研究全部是以就业机会的数目为分析对象，而不是以工资水平或弹性为分析对象。一些关于报酬的研究提出，美国的就业表现之所以比欧洲强劲，可能是因为美国的工资弹性较大，但本研究没有对这个因素进行评估。

观察一下所有发达国家在过去20年中创造就业的表现，可以看出，某些国家在为数有限的行业中取得非常好的成绩，例如美国零售业的就业取得很大增长；此外还可以看出，某些在这段时间内就业增长迅速的国家在开始时的就业类型搭配比较有利，例如农业或制造业所占的比重比较小。

然而，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在非欧洲国家的优异就业表现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归功于这些特殊的因素。另一方面，数据表明，由低解雇成本和低征税构成的一揽子政策在迅速创造就业方面发挥的作用要重要得多，欧洲与成绩良好的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异几乎全部归因于政策的不同。

如果把分析范围缩小到欧洲国家，统计数字在解释国家之间的差异方面的说服力要小很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荷兰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小时工的就业大幅度增加。尽管该国的经验给人以深刻印象并值得进一步研究，但整个欧洲的情况显示，小时工就业的增长有损于全日工的就业，因此代价高昂。

下文分5节探讨了这些问题：

- 第一节考虑到21个经合组织国家的产出和资本投资增长情况以及工作年龄人口的增加情况，依优劣程度排列了这些国家在过去20年中在创造就业方面的表现。
- 第二节利用农业、4个工业行业和6个服务业行业的就业数据讨论了每个行业的创造就业表现。
- 下一节探讨了创造就业与体制方面可变因素之间的关

系，这些可变因素的例子包括征税、工会的普及程度、解雇员工的成本以及失业救济。

- 第四节分析了欧洲内部的创造就业表现，特别是分析了小时工就业排挤全日工就业的程度，以及临时雇用（相对于长期雇用）合同所起的作用。该节还探讨了创造就业与年龄和性别组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不同种类的就业。
- 最后一节提出了若干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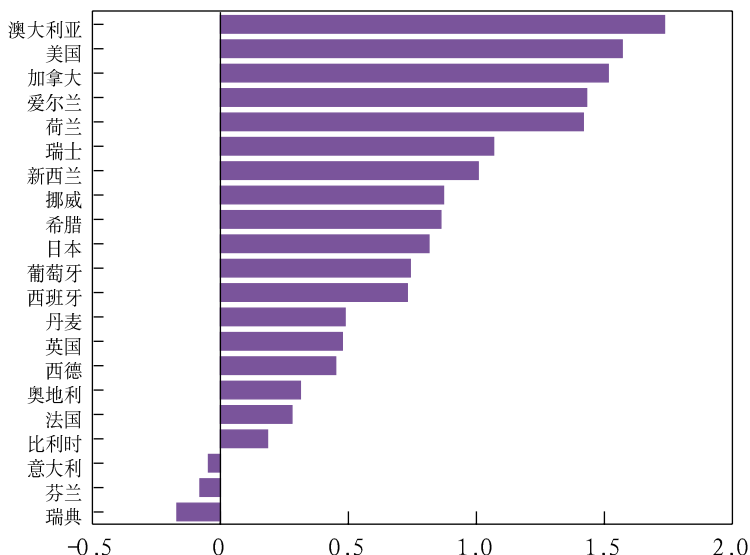
一. 创造就业速度慢和速度快的国家

在所研究的21个国家之间，过去20年中创造就业的成绩有很大差异。本项研究使用的抽样期间是1980年至1997年，因此在进行比较时消除了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从这个角度来比较，包括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在内的非欧洲国家超过了多数欧洲大陆国家，其中仅有荷兰和瑞士除外。在创造就业速度快的非欧洲国家，就业总数平均每年增加1.5%，与此相比，欧洲大陆每年的增加幅度不到0.5%（见图1）。

如果用绝对数字表示，这些差别是巨大的：例如，对于像意大利这样大小的国家来讲，就业增长率中每一个百分点相当于每年20万个工作机会，在17年的期间内就相当于350万。

如此巨大的差别究竟是反映出各国需要改革其劳动力市

图1. 平均就业增长率
经合组织成员国, 1980至1999年
(百分比)



来源: 经合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场, 还是应该从其他因素, 例如工作年龄人口的增加、总产出或资本投资中寻找原因? 数据使我们能够得到一些深入认识, 首先是关于工作年龄人口变化的认识。

如果一个国家的创造就业速度能够跟上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 人们通常会认为该国成绩不错。实际上, 一般而言, 工作年龄人口增长较快的国家创造的就业也比较多。用这个尺度衡量, 美国确实出现了就业奇迹, 该国创造的就业机会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 从而使失业率大幅度下降。在过去20年中, 尽管移民规模很大, 美国的就业与工作年龄人口比率仍增加了7个百分点以上。

用这个尺度衡量, 澳大利亚、加拿大、爱尔兰和新西兰

的排名会低一些，而英国和比利时的排名则会高一些，但整个排名仍然与前述类似，如果研究一下产出的增长情况，结论也是如此。

产出增长与创造就业之间存在固有的联系。如果假设（也许是不现实的假设），无论产出水平如何，劳动力和资本在生产中都占相同的比例，那么，创造就业和产出增长将不过是彼此的镜像。但在现实中，这种比例是变化的，生产率的提高引起就业和产出增长之间的差异。

在长期内，这些差异为了解就业增长的来源提供了线索。例如，一个国家如果正在开发某项新产品，或其国际竞争力无论任何原因正在提高，对其产出的需求量都会增加，因此，该国的就业也随之增加，以便满足新的需求。这样，爱尔兰在投资、尤其是高科技投资急剧增加的同时出现的就业迅速增长有一部分应视为产出增长的奇迹，而不是就业奇迹。与此相反，像希腊和瑞典这些国家的就业增长可能是为低下的产出增长所妨碍。

在研究中发现，与就业增长强劲的非欧洲国家经济相比，多数欧洲国家的经济用资本取代劳动力的程度较高。因此，劳动力市场制度灵活的国家可能创造的就业机会较多，因为这些国家除了追加资本投资，也通过雇用更多员工来满足需求的增长。一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认为，由于欧洲的工会在七十年代后期提高了索求，导致资本大量取代劳动力。加拿大资本存量的增加速度也大大超过就业人数的增加速度，这显示一些创造就业的潜力没有得到利用。

如果集中观察九十年代的情况，一些欧洲国家，特别是爱尔兰与荷兰的表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1990-1997年期间，爱尔兰领先于所有发达国家，平均年就业增长率达3%。最近，自从1995年以来，西班牙的创造就业速度也达到这个高水平，但是，至于这是否仅仅是商业周期的上升阶段所导致，得出结论还为时尚早。相形之下，瑞士的就业增长速度虽然在

1990年以前很高，但在此之后一直缓慢，与产出增长速度的放慢相一致。然而，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根据1990 - 1997年期间数据的排名与根据1980 - 1997年期间数据的排名相似。



二. 行业因素是否重要？

最近的研究报告提出，各国就业在经济部门之间的搭配情况，特别是农业和制造业就业的搭配情况历来有所不同，在造成就业增长速度的差异方面发挥很大影响。有一项研究报告提出，美国创造就业的速度之所以超过法国，是因为美国零售贸易业中就业机会迅速增加。这符合人们广泛持有的这一看法：美国创造的就业大部分是低技能和低工资的就业。基金组织的研究也确实证实，在所有创造就业速度快的国家中，零售业就业的增长都在总就业的增长中占很大比例，该行业就业在1983 - 94年期间的平均年增长率为0.5%，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美国，而且还发生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

基金组织工作人员的研究对11个国家的11个行业在1982至1994年期间的就业数据进行了分析。抽样国家虽然少于第一节中的国家，但其中包括了一些创造就业速度快的国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及荷兰，也包括了一些创造就业速度最慢的国家，如意大利、法国及瑞典。

该项分析证明存在这一可能性：就业在经济部门之间的最初搭配情况是全面创造就业情况的决定因素之一。例如，

1982年，在包括法国和意大利在内的若干创造就业速度慢的国家，农业和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所占比例很大，而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这两个部门的就业机会都在减少。

行业因素尽管很重要，但对于多数国家而言，仅能解释一小部分创造就业的表现，不对各国在全面就业增长方面的排名产生很大影响。上述分析结果也不支持这一观点：就业增长方面的差异大部分是零售贸易引起的。如果走到极端，假设零售贸易业不创造任何就业，成绩优异的非欧洲国家仍然远远领先，创造就业的速度最快，而且全面排名也没有变化。

利用一种对以下情况进行估计的核算方式，对历史上不同的就业搭配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检验：假设每个国家在1982年的就业构成与所有抽样国家的平均构成相同，该国的整个创造就业情况将会如何。检验结果显示，所有创造就业速度慢的国家都受碍于不利的历史条件，而创造就业速度快的国家则受益于有利的条件，诸如农业和制造业的就业所占比例较低。尽管如此，国家排名仍然基本不变。

一些在开始时农业就业人数众多的国家是例外，尤其是南欧国家。如果不加改动地以粗略的核算结果为依据，假设意大利的行业就业搭配情况在1982年与抽样平均数相同，该国在1994年的就业人数至少会增加120万个，在各国中的名次会提前很多。

利用另一种对以下情况进行估计的核算方式，还可以对一些国家的优势和另一些国家的劣势进行评估：如果每个国家的每个行业的增长速度与所有国家的平均数相同，该国创造就业的总体表现将会如何。评估结果显示，在各国之间的总差异中，仅有大约五分之一可归因于在开始时按行业区分的就业构成。

在决定一个国家创造就业的成绩方面，该国就业市场的运作所起的作用大大超过按行业区分的历史就业格局，这里

的最后一个例子是，在调查的所有11个行业中，美国创造的就业都超过意大利（见图2）。图中显示，意大利受到的行业影响虽然最为不利，但也不大可能解释为什么该国创造就业的表现不如美国。



三. 创造就业与经济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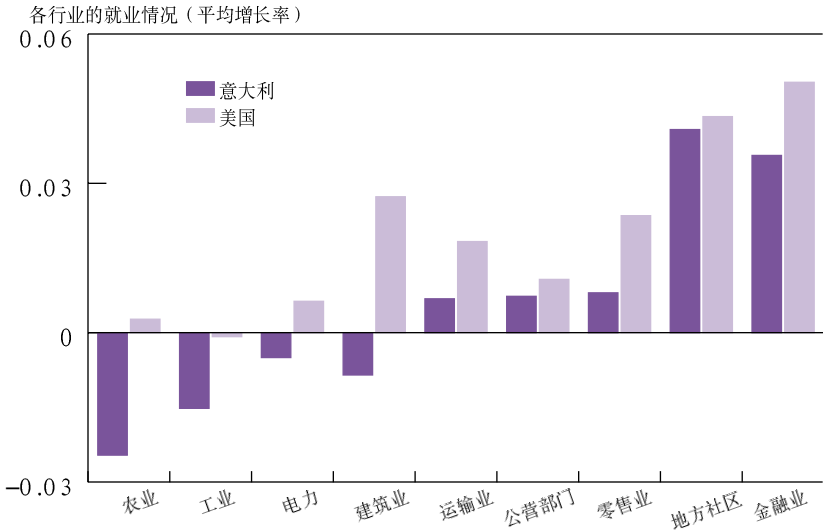
既然行业差异只能部分解释各国之间就业增长情况的不同，我们必须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关键的原因。

一个很可能找到答案的地方是就业增长与劳动力市场政策和制度之间的关系。基金组织的研究探讨了像失业救济、工会势力及其讨价还价的做法以及征税水平这样的因素。这项研究还探讨了若干对解雇成本产生影响的做法，这些做法也称为保护就业立法，其中包括雇主必须向雇员发出的通知数量以及必须向被解雇的员工支付多少个月的工资，并包括在解雇之前需要经过的程序的复杂程度。

早先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一般侧重于失业趋势，就上述因素的作用达成了各种不同的结论。

例如，在多数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理论分析模型中，较高的失业救济导致较高的失业和较低的创造就业水平。在实践中，较高的失业救济也伴随着较高的失业率。工会的势力是以工会合同所覆盖的员工比例来衡量，并导致工资和失业率的上升，但如果工会和公司协调其讨价还价活动，上升的程度则比较小。

图2. 意大利和美国各行业创造就业情况：
1982至1994年



关于征税和各种保护就业立法的公开辩论显示，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并非那么清晰。根据理论，征税变化对失业产生的影响基本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通过降低薪酬的形式把增税转嫁给劳工的程度，以及劳动力供应对薪酬变化的反应灵敏程度。例如，有一项研究显示，减税只有在提高净工资与失业救济金的比率时，才会增加就业。

另一项分析则提出，在长期内，对劳动力的任何征税都终将由雇员承担，其证据是，在现实中，总征税与劳动力成本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另一些研究则根据理论和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的论点，认为较高的征税会增加失业和降低产出。本研究收集的证据显示，欧洲的工会具备把部分增加的税负转嫁给公司的能力。此外，根据观察，失业随着征税总额增加，但并不随着工资税增加。

多数理论研究都预言，高昂的解雇成本并不对失业率造成影响。这种观点的推理是，由于保护就业措施提高了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改变其劳动力现状的成本，雇用和解雇都会有所减少，但对于平均就业率的净影响不易辨别。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是，与在北美观察到的情况相比，欧洲国家失业人口的流入量和流出量都很小。然而，另一个观点认为，如果解雇成本上升，会在一、二十年的时间内导致企业家用资本取代劳动力。这种观点与主要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在收入中所占份额下降的情况是一致的。

如果集中分析中期内的就业增长情况，将证实早先的失业研究所查明的若干实证关系。基金组织的研究发现，如果工会的势力较大，创造的就业则较少，并发现在工作年龄人口的增长与创造就业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相形之下，各国在失业救济方面的差异看来仅对创造就业产生微乎其微的影响。

从政策角度出发就更容易看出，广泛的保护就业立法看来妨碍创造就业，全面的高征税也是如此。为使这些关系量化所进行的进一步检验证实，尽管保护就业立法与创造就业之间的联系较强，但与总征税的关系同样相当密切。

具体而言，为本研究进行的计量显示，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保护就业立法的力度在所有国家中的名次降低5位，其平均创造的就业将增加0.1至0.2个百分点。例如，对意大利来说，这相当于每年20000 - 40000个工作机会，在20年的时间内就是40万至80万个工作机会。如果把总征税在产出中所占份额削减1个百分点，平均创造的就业将增加大约0.05个百分点。

这些结论的可靠程度如何？在解释这项研究的统计结果时必须谨慎从事，这特别是因为进行的观测很少，而且某些政策可变因素之间高度相互关联。在确定原因和影响时特别容易产生误差，尽管如此，研究结果仍与某些早先的发现比

较一致，但与另一些则并非如此。例如，关于解雇成本高昂引起创造就业表现疲弱的发现符合这一观点：如此高昂的成本也导致雇主用资本取代劳动力。

本研究的各项发现可能在原则上也符合这一传统的观点：保护就业立法在繁荣时减少雇用人数，在衰退时则减少解雇人数，因此对就业没有净影响。如果能够把1980 - 97年期间视为经济繁荣期，这一解释将更为令人信服，因为在此期间内，在像欧洲大陆各国这样的解雇成本高昂的国家，就业增长幅度较小，而在像美国这样的解雇成本不高的国家，就业增长幅度则较大。然而，欧洲和美国在过去20年中都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上升和下降，这使得认为较高的解雇成本对于就业没有任何影响的观点较为难以令人接受。

在研究中发现的总征税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符合这一观点：随着欧洲的增税，额外的税负越来越多地被转嫁给雇主，导致他们减少雇员人数。然而，研究人员在这种情况下预期，较高的薪金税应比总税负更为妨碍就业。但是，基金组织的研究没有发现任何统计上的证据能够支持这一预期。



四. 欧洲内部的情况

较高的征税和解雇成本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像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取得良好成绩的非欧洲国家与多数欧洲大陆

国家之间在创造就业方面存在差别，但是，欧洲内部的大幅度差别仍然不能得到解释。为了深入理解欧洲的情况，本研究分析了11个欧洲联盟成员国之间在1983 - 97年期间的差别。在研究中检查了根据合同类型（小时工还是全日工、临时工还是长期工）区分的就业构成、创造就业的经济部门、以及新雇用员工的年龄和性别。此外，还在研究中检查了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例如由青年填补全日工职位的程度。最引人注目的发现是，荷兰作为创造就业成绩最好的欧洲国家，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所创造就业的大约一半是由25 - 49岁妇女填补的小时工职位，尤其是服务业职位。

这项研究发现，创造的就业机会的种类主要取决于技术发展或劳动力供应。在几乎所有欧洲联盟成员国，妇女就业的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男子就业，反映了妇女所参与的劳动力种类的增长。青年就业的下降看来与以下两个因素部分有关：就学年数的增加和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例如解雇成本高昂。

尽管所有国家25 - 49岁人口的就业都有所上升，但50 - 64岁年龄组的就业情况却参差不齐，这部分反映了若干国家退休年龄提前的趋势。经济行业的变化也对按年龄和性别区分的就业情况产生影响，特别是随着所有国家服务行业的扩展，25 - 49岁妇女的就业增长迅速。

合同与创造就业

一个关键的政策问题是，小时工所占比例的上升是否与全面创造就业的加速有关。荷兰在这方面明显超过其他国家，该国创造的就业机会有一半归功于小时工合同。荷兰在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改革看来引起小时工就业的急剧上升，从而促进了全面就业。与此同时，如果把这11个欧洲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这项研究则没有发现任何明确的证据，可以表明小时工所占比例的增加导致整个欧洲创造更多的全面就业，或是导致以下三个经济部门中的任何一个部门创造更多的全面

就业：农业、工业和服务业。

为了估计小时工的增加引起全日工作机会丧失的程度，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在研究中把欧洲总就业的增长情况与小时工所占比例的上升情况进行了比较。

在研究中提出了这一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增加100个小时工机会，该国将在创造就业方面出现何种情况？研究采用了三个基准尺度进行分析。第一，如果全面就业也增加了100个工作机会，则根本不存在排挤全日工的效应。第二，如果全面就业增加了50个工作机会，以小时工的每周平均工作小时大约相当于全日工的一半为前提，则总工作小时没有净增加，也没有净减少。第三，如果全面就业没有变化，增加的100个小时工机会则完全排挤了全日工作机会。

采用这个方式取得的分析结果显示，小时工就业的增加一般会排挤某些全日工，但也致使就业机会总数有一定程度的增加。

如果观察一下具体国家内每个行业创造小时工就业的情况，例如，仅观察法国的工业、农业和服务业部门的情况，会得到更为丰富的数据，使我们能够估计某个具体行业中小时工就业的增加与总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估计该行业对该国的全面创造就业表现作出的贡献。这种分析将突出表明，技术性考虑因素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用多少小时工取代全日工。

研究发现，在服务业中，小时工就业的增加既导致全面工作机会数目的增加，也部分排挤了全日工作机会。这样的研究结果强烈显示，工作小时数目可能没有任何净增加，但是，显然应该在这方面做进一步调查。

在分析了小时工问题之后，再研究一下临时工问题，在这方面明显超过其他国家的是西班牙，该国在过去20年中净创造的就业全部是临时工作机会。同样，八十年代初期进行的改革由于在解雇成本极高的背景下使得临时工就业成为可

能，看来促成了临时工就业机会的激增，而与此同时，全面的就业增长非常缓慢。在西班牙，临时工就业当前所占的比例为三分之一，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

鉴于西班牙和意大利的解雇成本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易于诱使人们设想，在解雇成本高昂的国家，就业的临时工较多，或所占比例不断增加。然而，并没有强有力的统计证据来支持这一看法，在把西班牙排除在抽样国家之外的情况下尤其如此。

荷兰与西班牙所发生的情况明显不同，这显示，与临时雇用合同相比，把小时工雇用合同作为创造就业的途径可能更具成功希望，支持这一结论的证据是，员工们一般更喜欢小时工雇用合同，而不是临时雇用合同。

1997年在欧洲联盟进行的调查发现，大约58%的小时工并不希望转变为全日工，而在荷兰，72%的小时工不愿转变为全日工。相比之下，在欧洲，仅有7%的临时工说自己不愿转变为长期工，而在西班牙，87%的临时工无法找到长期工作，不愿转变为长期工的人所占比例微不足道。



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结果如下：

- 一套由低员工解雇成本和低征税组成的政策可能在迅速创造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欧洲大陆与

成绩优异的非欧洲国家之间的差别看来几乎全部归因于这些政策。

- 广泛的保护就业措施以及较高的全面征税水平看来有碍于创造就业。关于高解雇成本引起创造就业表现疲弱的结论看来符合这一观点：这种高成本还导致雇主用资本取代劳动力。
- 在欧洲大陆内部，小时工的增加趋势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在增加就业方面比其他国家更为成功。
- 正如荷兰的成功所显示的那样，小时工雇用合同很可能受人欢迎，特别是为工作妇女所欢迎。然而，为了确定这是否导致就业机会数目的大量净增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相比之下，正如西班牙的情况所显示的那样，临时雇用合同更可能导致就业类型的相互替代，而不导致就业的实际净增长。
- 减少障碍，以便更多采用小时工雇用合同尽管是明智的，但不应利用这种合同来推迟其他必要的劳动力市场改革。
- 行业因素，无论是农业和制造业在开始时所占比重很小，还是数目有限的若干行业表现良好，都只能解释各国之间在全面创造就业表现方面所存在差别中的一小部分。

本文所依据工作文件的全文以及附表和附图载于基金组织的网站：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CAT/shortres.cfm>

经济问题丛书

1. *Growth in East Asia: What We Can and what We Cannot Infer.* Michael Sarel. 1996.
2. *Does the Exchange Rate Regime Matter for Inflation and Growth?* Atish R. Ghosh, Anne-Marie Gulde, Jonathan D. Ostry, and Holger Wolf. 1996.
3. *Confronting Budget Deficits.* 1996.
4. *Fiscal Reforms That Work.* C. John McDermott and Robert F. Wescott. 1996.
5. *Transformations to Open Market Operations: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Emerging Markets.* Stephen H. Axilrod. 1996.
6. *Why Worry About Corruption?* Paolo Mauro. 1997.
7. *Sterilizing Capital Inflows.* Jang-Yung Lee. 1997.
8. *Why Is China Growing So Fast?* Zulu Hu and Mohsin S. Khan. 1997.
9. *Protecting Bank Deposits.* Gillian G. Garcia. 1997.
10. *Deindustrialization - Its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Robert Rowthorn and Ramana Ramaswamy. 1997.
11. *Does Globalization Lower Wages and Export Jobs?* Matthew J. Slaughter and Phillip Swagel. 1997.
12. *Roads to Nowhere: How Corruption in Public Investment*

Hurts Growth. Vito Tanzi and Hamid Davoodi. 1998.

13. *Fixed or Flexible? Getting the Exchange Rate Right in the 1990s.* Francesco Caramazza and Jahangir Aziz. 1998.

14. *Lessons from Systemic Bank Restructuring.* Claudia Dziobek and Ceyla Pazarbaşıoğlu. 1998.

15. *Inflation Targeting as a Framework for Monetary Policy.* Guy Dehelle, Paul Masson, Miguel Savastano, and Sunil Sharma. 1998.

16. *Should Equity Be a Goal of Economic Policy?* IMF Fiscal Affairs Department. 1998.

17. *Liberalizing Capital Movements: Some Analytical Issues.* Barry Eichengreen, Michael Mussa, Giovanni Dell'Ariccia, Enrica Detragiache, Gian Maria Milesi-Ferretti, and Andrew Tweedie. 1999.

18. *Privatization in Transition Countries: Lessons of the First Decade.* Oleh Havrylyshyn and Donal McGettigan. 1999.

19. *Hedge Funds: What Do We Really Know?* Barry Eichengreen and Donald Mathieson. 1999.

20. *Job Creation: Why Some Countries Do Better* (创造就业: 为什么一些国家取得较好的成绩). Pietro Garibaldi and Paolo Mauro. 2000.

Pietro Garibaldi是米兰Bocconi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他曾任基金组织研究部经济学家，并在此期间成为本文所依据工作文件（WP/99/109）的联合撰稿人之一。Pietro Garibaldi在伦敦经济学院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Paolo Mauro是基金组织研究部经济学家，曾在欧洲一部工作，并在此期间成为第WP/99/109号工作文件的联合撰稿人之一。Paolo Mauro在哈佛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